

恩格斯对杜林道德论的历史阶级批判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叶德力·杰恩斯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对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批判, 深刻阐明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性与阶级性本质,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道德观。文章梳理了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还原道德经济根源的逻辑理路, 揭示了道德发展的辩证规律。在此基础上, 结合新时代道德建设实践, 探讨了该理论对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虚伪性、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

恩格斯, 《反杜林论》, 道德, 历史唯物主义

Engels' Historical Class Critique Logic of Durkheim's Moral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Ye Deli Jenkins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3, 2026; accepted: April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Engels, through his criticism of Durkheim's theory of "eternal morality" in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profoundly expounded the historical and class nature of morality as a social ideology, and established the Marxist scientific moral view. The article outlines Engels' logical path of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store the roots of moral economy and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laws of moral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theory explores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for criticizing the hypocrisy of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in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Engels,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Morali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深刻把握道德建设规律，2019年出台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刻阐明了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1]。这表明，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不再仅仅是规范行为的工具，而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的初衷，并非仅为回击欧根·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衅，更在于清算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泛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2. 问题的缘起：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形而上学本质

杜林所构建的庞大哲学体系，其内在的逻辑困境在道德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即试图确立一种超越时空、统摄一切社会形态的“永恒道德”。这种理论建构不仅在认识论上倒置了思维与存在的关联，在历史观上呈现出脱离具体社会实践的思辨特征，更为后世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经济决定论与道德能动性”的张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反面参照。

杜林道德观的建构逻辑，始于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预设。他宣称哲学是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终极真理”体系，而这种真理并非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总结，而是源于思维内部固有的“原则”，“道德的基本法则的真理性是包罗万象的”([2], p. 198)。在杜林看来，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并非从客观现实出发，而是从头脑中的“原则”出发，再将现实世界强行纳入这些原则的框架之中。具体到道德领域，杜林断言道德规范并非产生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源于某种先验的、抽象的“意志”或“人性”，“我们的思维的自然作用是巨大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它不能制驭的事物”([2], p. 36)。这种“原则在先”的方法论，直接割裂了道德与物质生产实践的内在联系，将道德神秘化为一种独立于人类历史进程之外的精神实体。正如恩格斯所批判，杜林不仅把“原则”当作出发点，更将其视为检验现实的唯一标准，这无疑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拙劣模仿与倒退。

基于这种先验论的认识论底色，杜林进而自信地宣称发现了道德领域的绝对确定性。他认为，道德真理具有不可更改的永恒属性，任何试图将道德相对化、历史化或阶级化的观点，皆是对真理客观性的消解。在他的话语体系中，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被固化为截然对立的静态范畴，既不随时代生产力的变迁而转移，也不因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而产生分野。为了赋予这种“永恒道德”以逻辑上的自洽性，杜林引入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将复杂的道德主体抽象化为脱离一切具体社会关系的“两个人”，试图通过纯粹分析这两个抽象个体之间的意志关系(如平等、压迫等)，推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公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资产阶级的法律权利用语普遍化为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杜林眼中的“永恒

道德”，不过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狭隘道德观念的投影，却被冠以“科学”和“真理”的头衔，妄图以此统摄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凌驾于“历史之上和先进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 [3]。

归根结底，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层困境在于其反历史主义与反实践的理论特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源深深扎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是事实与价值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辩证统一。杜林试图切断道德与经济基础的脐带，将道德视为一种纯粹的思维产物，这不仅无法有效解释人类历史上道德观念的剧烈演变与冲突——例如，为何建立在人身依附基础上的古典时代道德与强调形式平等的现代道德存在本质差异——反而使其理论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当杜林用僵死的“永恒道德”去裁量鲜活且充满矛盾的社会历史时，必然会遭遇现实的抵触，进而不得不为了维护其理论体系的“圆满”而对现实历史进行主观的剪裁与歪曲。

3. 恩格斯对道德“历史性”与“阶级性”的辩证还原

针对杜林将道德视为永恒真理的唯心主义谬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并未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的反驳，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显微镜，深入剖析了道德产生的物质根源与历史演变机制，即“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4], p. 99)。

恩格斯确立了考察道德问题的唯物主义出发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不同于杜林从抽象的“两个人”出发推导道德公理，恩格斯敏锐地发现，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流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始终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这种道德观念的多样性与变动性，本身就是对杜林“永恒道德”论最有力的证伪。如果道德真的如杜林所言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那么人类历史就不应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且充满矛盾的道德图景，而应是某种单一原则的机械重复。进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道德观念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经济关系的变革。他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这一经典论断阐明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例如，“切勿偷盗”这一看似永恒的道德戒律，实则建立在私有制即动产存在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4], p. 99)。如果在一个废除了私有制、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偷盗动机本身已不复存在，那么宣扬“切勿偷盗”不仅是多余的，甚至会成为一种滑稽的废话。由此可见，任何道德规范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历史前提，一旦脱离了产生它的经济土壤，所谓的“永恒真理”便会瞬间丧失其神圣光环。

为了进一步论证道德的历史性，恩格斯考察了当时欧洲社会并存的三种道德体系：基督教封建道德、现代资产阶级道德以及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 ([4], p. 98)这三种道德分别代表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关系。封建道德维护土地贵族特权，资产阶级道德强调自由竞争，无产阶级道德指向消灭剥削。它们在同一时空的激烈冲突，雄辩地证明了道德并非某种绝对命令，而是社会经济结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投射。每一种道德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也必然随着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消亡而走向衰落。这种历史辩证法打破了剥削阶级利用“永恒道德”固化既得利益的企图，指出道德不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动态力量。

在揭示道德历史性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剖析了道德背后的阶级实质。他深刻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4], p. 99)这一论断刺破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精心编织的“超阶级道德”谎言。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中，根本不存在一种能够同时满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利益的普遍道德。每一个阶级都有其独特的道德标准，直接源于该阶

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例如，封建领主推崇忠诚与等级，旨在维系人身依附关系；新兴资产阶级奉行自由与契约，旨在确保资本流通与增殖。这两种截然对立的道德观，并非源于先验的人性差异，而是各自阶级利益的必然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将符合自身特殊利益的道德规范包装成普世的、永恒的人性法则，妄图以此束缚被压迫阶级的思想。他们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天赋人权，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资本家剥夺工人剩余价值的合法性；他们鼓吹“博爱”，实际上是为了掩盖阶级剥削的残酷现实。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全人类道德”，在阶级对立尚未消除之前，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幻想。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一种真正超越阶级利益的道德规范。因此，恩格斯对道德“阶级性”的还原具有极具革命性的意义。它为无产阶级识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一种真正超越阶级对立的、真正的人类道德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道德，即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4], p. 99)

然而，恩格斯对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批判，虽然强调道德的历史性与阶级性，但绝非陷入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深刻揭示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与历史继承性。恩格斯首先承认了不同历史阶段道德规范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历史背景”。针对杜林的诘问，恩格斯辩证地指出：既然封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种道德论代表了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必然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因而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共同之处。例如，“切勿偷盗”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都适用，是因为这两种社会形态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这种“共同性”并非源于道德本身的超历史性，而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在特定历史时段内的延续性。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道德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与滞后性。作为上层建筑，道德往往不能像镜子一样即时反映经济基础的变动。旧的道德观念具有强大的惯性，即便在旧的经济基础瓦解后，依然可能长期盘踞在人们头脑中。例如，在资本主义确立后的欧洲，封建贵族的荣誉观依然存在。这说明道德的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轨迹，受传习俗、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必须在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中考察道德的演变机制。

基于这种辩证理解，恩格斯提出了对人类道德遗产进行辩证继承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道德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口号，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时曾具有历史进步性。无产阶级并不是要否定这些价值本身，而是要剥去其虚伪的阶级外衣，将其从抽象的法律权利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权利。这种“扬弃”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批判中建构、在继承中创新的理论品格。

最后，恩格斯将道德的辩证发展引向了对“真正的人类道德”的展望。道德的进步并非直线向上，而是充满了曲折。但在总体趋势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消除，道德将逐渐摆脱阶级偏见的束缚。那种“超越阶级对立”的真正人类道德，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坐等那个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必须在当前的阶级斗争中，通过践行先进道德，为未来社会的道德大厦奠定基石。这一论述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底色，又充分发挥了道德在改造世界中的能动作用，从而完成了对杜林形而上学道德观的彻底超越。

4. 当代意蕴：科学道德观对“普世价值”思潮的有力回应

重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永恒道德”的批判，其理论旨趣并未随着19世纪特定历史语境的消息而终结。在当代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伦理规范，成为国内外伦理学界和政治哲学界争论的焦点。当代西方学术界(如社群主义者麦金太

尔在《追寻美德》中)对启蒙运动以来“普遍理性”的深刻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理论共鸣。深入挖掘恩格斯道德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客观审视当代全球伦理话语中的“抽象普遍主义”倾向,以及在历史具体性中探索新型伦理共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恩格斯的历史分析法为反思当代“抽象普遍主义”道德话语提供了锐利的认识论工具。在当前的国际思想界,存在一种试图确立跨越历史阶段与地域限制的“普遍伦理”的理论倾向。这种倾向在逻辑结构上与杜林的形而上学道德观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即试图剥离道德观念赖以生成的具体社会经济基础,将其上升为一种先验的、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终极规范。然而,正如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贡献恰恰在于揭示了道德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当特定地域或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被包装成“普遍真理”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时,往往掩盖了其背后的特定利益诉求与资源分配逻辑。如果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视野,盲目接受这种未经历史语境化处理的抽象道德符号,便容易在跨文化交流中忽视全球资源分配的结构差异,进而陷入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逻辑之中,将特定区域的发展模式误认为人类历史的唯一归宿。

其次,恩格斯关于道德与社会利益结构的论述,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话语非对称性提供了现实的分析框架。尽管传统的阶层对立话语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已发生复杂演变,但国际范围内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利益分化依然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抽象普遍主义”叙事,往往难以真正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公平发展与国际秩序变革的深层诉求。恩格斯的理论提示我们,在现实的利益差异尚未弥合之前,不存在一种悬浮于社会矛盾之上的抽象道德。因此,在参与全球伦理对话时,学术界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厘清不同道德话语背后的现实社会基础。这并非走向相对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而是强调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正视发展阶段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跨文化对话来寻求真正的价值共识。

最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真正人类道德”的宏伟展望,为当代新型伦理规范的建构确立了从“抽象普遍”走向“具体普遍”的逻辑进路。恩格斯认为,真正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道德,必须建立在消除根本利益冲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这一论断表明,任何有效的伦理规范都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的自我演绎,而必须扎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这一学理逻辑出发,当代中国所推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及在国际社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被视为对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当代回响。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伦理规范的建构,其学理正当性不仅在于它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更在于它试图超越西方传统中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权利的道德叙事,转向一种基于社会连带责任和历史具体性的新型价值观。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的伦理愿景,并非一种先验的、强加于人的道德预设,而是建立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生态与发展危机日益呈现出跨界特征这一“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之上的。它试图在承认各国历史差异性与发展阶段性的前提下,通过互利共赢的现实交往,逐步凝聚起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伦理共识。这种建构逻辑,正是将恩格斯关于道德的历史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之中。

综上所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道德观的批判,不仅完成了对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哲学清算,更为确立科学的道德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全球思想格局中,重读经典,引入更为多元的学术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有助于我们超越抽象普遍主义的理论盲区。这要求我们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和严谨的学术姿态,参与到当代全球伦理共识的建构进程中,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参考文献

- [1]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0/27/content_5445556.htm, 2019-10-27.
- [2] [德]E·杜林. 哲学教程[M]. 郭官义, 李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0.
- [4]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9.